

編後語

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是現代國家健康發展的三大支柱。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國大陸(以下「中國」所指均為「中國大陸」)大踏步地邁向了市場經濟，但在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的發展上卻大大滯後。任何一個平衡的物體都必須靠三個支柱來支撐，而一個國家的發展顯然不能依靠單一的經濟支柱。中國的確取得了驚人的經濟增長，但與此同時，各種社會矛盾卻日益突出。要推進中國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公民社會的成長至關重要。

本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選刊了三篇文章，分別從不同的視角、在不同的視場，對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進行了評估。汶川大地震給2008年的中國帶來大災難，但是卻出人意料地推動了中國公民社會的大發展。大批民間公益組織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志願者出現在地震災區，從而使「公民社會」和「NGO」這些字眼第一次以正面的形象出現在大眾媒體甚至政府話語之中。朱健剛和陳健民系統地分析了抗震救災為中國公民社會發展帶來的契機，冷靜地指出了其中的困局，即建構新型國家—公民關係的長期性、曲折性和複雜性。

如果說抗震救災提供了一個契機，那麼互聯網則為中國公民社會提供了組織渠道和發展平台。楊國斌描繪了「網絡公民社會」的全新景象。各種公民行動借助無遠弗屆的互聯網展示着自己的力量，監督着公共事務，影響着社會輿論。儘管政府對互聯網的管制依舊嚴厲，但是中國的網絡公民社會卻在全球化、市場化和實體公民社會形成等多元因素的互動之中不可阻擋地發展起來，並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網絡公民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也面臨着來自兩方面的挑戰：一方面是虛擬空間中的「信任危機」，其中可以看到來自政府的幢幢暗影；另一方面則是娛樂化的消解效應，其中市場中的商業化力量尤具破壞力。

同其他領域一樣，公民社會在中國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社會服務型公民社會組織自然容易獲得政府的接納，但是宗教性民間組織的命運就大為不同了。邢福增從公共政策分析的角度，討論了民間基督教組織在中國面臨的困境。因為民間組織登記註冊必須與相關國有機構建立所謂的「掛靠制」，大量民間基督教組織無法獲得行政主管部門的認可而找不到「掛靠單位」，因此也就無法登記註冊成為合法組織。中國民間組織政策的僵硬性，不僅阻礙了公民社會的順利發展，也妨礙了宗教自由的真正落實。

本期還刊登了多篇有意思的文章。裴毅然和王鋒從不同的側面描繪了中國共產黨內「知識群體」的生態及其對執政黨幹部隊伍形成的影響，而謝泳則通過一個案例展示了黨和國家在建國初期對於高級知識份子的控制意圖和震懾力。中國電影的娛樂化傾向日趨明顯，但在曹怡平的筆下，電影分級制度的難產歸根結底還是電影審查制度所基於的政治體制。